

泰国北部华人穆斯林身份认同的变化^{*}

合富祥 冯 瑜

内容摘要 : 本文探讨了近现代以来泰国华人穆斯林的身份认同的变化,旨在阐明泰国华人穆斯林群体不能简单地被归为一个同质化的群体,对此类人群的分析也不能仅仅停留在地方或国家的层面上,华人穆斯林在所处社会中的“同化”问题是个更加复杂的问题。

关键词 : 泰国 华人穆斯林 身份认同

作者简介 : 合富祥 (Suchart Setthamalinee), 泰国西北大学 (Payap University) 宗教、文化与和平研究中心教授 ; 冯瑜,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讲师。

华人穆斯林不是像许多研究中描述的那样简单地被当地社会同化。事实上,为了能够在身处国 (host country) 骄傲并有尊严地生活下去,华人穆斯林具有清醒的意识来决定自己的社会、经济和宗教生活,而不仅仅只是迫不得已地变成一个温顺的臣民,然后完全融入到泰国社会中去。根据之前的研究数据及笔者在泰北和中国的穆斯林社区所做的田野调查,笔者认为,泰北华人穆斯林的身份认同经历了从地方到国家再到最近的跨国的身份认同的变化。泰北华人穆斯林身份认同的变化可以根据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划分出三种主要的身份认同:中国商人(1940年以前);泰国穆斯林(1940年~1990年);跨国穆斯林(1991年到现在)。这种划分是根据泰国社会政治经济活动变化以及跨国穆斯林政治活动的发展而划分的。1940年前,泰国被称为暹罗(Siam),暹罗是一个在国内执行民族多元政策的国家。泰北华人穆斯林,主要是第一代泰北华人穆斯林,被当地人或山地民族识别为“中国商人”,这种识别基于他们从事着与其他人明显不同的经济活动。1939年,暹罗(Siam)被更名为泰国(Thailand),泰国政府对华人实行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政策,将华人及其他民族视为与本国土著居民完全一样的人群。结果是,泰国国内的绝大多数华人接受了自己的国族身份(national identity),华人自身拥有的民族语言或文化方面的东西,逐渐被这样的国族认同取代了。^A当时的泰国华人穆斯林就是生活在这样的民族主义政策中。然而,从1991年开始,随着通讯(如国际互联网、伊斯兰网站)和交通设施(特别是连接泰国和阿拉伯国家的交通)的发展,促进了泰国华人穆斯林跨国身份认同的建构。

一、“中国商人”的身份认同(1940年以前)

在云南与东南亚地区间的长途贸易中,云南马帮贸易扮演重要的角色。历史上的云南回族曾经是优秀的商人和士兵。这两方面特性的结合,使得回族控制了与吐蕃、阿萨姆邦、及东南亚地区间的马帮贸易活动。大多数的马帮由50到100匹骡马组成,从北向南将茶叶、丝绸、金属、器具、布匹、新鲜的蔬菜、盐、云南干巴等货物从思茅运往清迈,然后又从南向北运回染料、木料、棉花、烟草和鸦

^{*}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移民的宗教文化扩散、适应及认同——基于入滇回族的宗教地理研究》(项目编号:40961006)阶段性成果,云南大学“211工程”三期民族学重点学科建设项目海外民族志《泰国北部“秦和”穆斯林的民族志研究》(项目编号:21132022-10006)阶段性成果。

^A Charles Keyes, “‘The Peoples of Asia’ - Science and Politics in the Classification of Ethnic Groups in Thailand, China, and Vietnam,”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61, No. 4, 2002.

片。^A1873 年杜文秀云南回民起义失败之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期, 许多云南穆斯林开始在泰国北部包括清迈 (Chiang Mai)、清莱 (Chiang Rai)、南邦 (Lampang) 和湄宏顺 (Mae Hong son) 在内的一些主要城市中定居下来。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 一个规模不大、但财力雄厚且具有影响力的云南穆斯林社区 (王和社区) 在清迈基本成形, 该社区的云南穆斯林主要从事跨境马帮贸易, 同时也为清迈城中的云南人开的商店提供各种各样的商品。在 20 世纪最初的 30 年中, 泰北的“秦和”(“秦和” Chi-Haw 或“和” Haw 泰国人对云南籍华人的称呼——笔者注) 穆斯林社区十分繁荣, 并继续慢慢扩展到一些城市特别是清迈和清莱的市中心。尽管人们普遍假设认为, 一些“秦和”人不断在云南和金三角地区的鸦片运输非法贸易中获利, 但大多数云南穆斯林坚决否认参与这项贸易, 并坚持认为这是一种“不干净的”或“不道德的”生意。^B

20 世纪初期, 在清迈穆斯林社区最初建立的年代, 社区中的许多华人穆斯林仍然从事着马帮贸易, 有的是跨国跨境贸易, 有的是境内贸易。一些境内马帮充当着“中间商”的角色, 来往于山地部落民族以及各省份的泰族人之间。一位祖籍在云南纳家营的穆斯林, 当面对我们的采访的时候, 他这样说到: “泰国本地人和山地民族都认为我们是很好的中国商人。他们喜欢我们卖的商品, 例如茶叶, 棉布, 丝绸和器具等等。事实上有两类‘秦和’商人: ‘秦和’穆斯林和‘秦和’非穆斯林。但是那个时候很多人都意识不到这两种人的差别, 因为这两种‘和人’都非常相似: 相同的长相; 说同样的云南方言; 有同样的职业。我们之间的区别仅仅是我们的宗教信仰不同。因此外人总觉把我们认作‘秦和’商人, 而不太注意我们的穆斯林身份。”当被问及“秦和”这个词汇意思的时候, 他说不知道这个词汇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词汇既不是中国话、也不是云南话中的词汇。他说: “他们叫我们‘秦和’商人, 但我不知道‘和’这个词是从哪里来的。既然似乎每个人都喜欢用这个词, 那么我们就用它来命名我们的村子: 王和(和村), 因为当地人已经认可并习惯用这个词汇了。”

由于具有很多生意方面的知识和技能, 清迈和其他泰北主要市中心的中国穆斯林很快发展成为成功的“中间商”。根据 Hill 的论述, “秦和”穆斯林的马帮来往穿梭于遍及各地的当地制造商之间, 也来往于远离市场和坝区的山地民族之间, 他们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中间人的角色。^C此时, 已经以“本地商人”的面貌出现的云南人, 似乎与泰国其他群体有着密切的联系, 特别是那些居住在山地的民族。对于在第一个时期的中国穆斯林移民来说, 当他们建立起他们自己的社区的时候, 毫无疑问, 为经济的成功和生活的稳定而奋斗成为他们独特的品质, 这也成为了他们主要的身份认同标志。泰北本地泰族和山地民族都喜欢用“老板”这词汇来称呼云南穆斯林移民。

根据 Rawi Abdelal 等人的论述, 某类人群的集体身份认同 (collective identity) 与比较和参照他人的集体身份认同存在一定关系, 在这种比较和参照中, 身份被区别了出来。与集体身份认同有关的内容可以看作是一种对构成现实社会人群之间各种关系的话语建构 (discursive formulations)。^DMichael Barnett 在他的有关中东和平进程的研究中, 为“身份认同”(Identity)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定义: 身份认同是“人们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对自我的理解。各式各样的身份认同, 简单地说, 不是纯个体的或心理的东西, 它们是最基本的社会和亲属关系, 它们通过行为者与他人的互动及相互关系来定义; 因此, 一些身份认同有可能是暂时的, 它们取决于行为者与他人的互动, 以及所处的制度文化情境。”与世界

A Andrew Forbes, "The Role of Hui Muslims in the Traditional Caravan Trade between Yunnan and Thailand," in *Asian Merchants and Businessmen in the Indian Ocean and the China Sea*, D. Lombard and J. Aubin, ed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287-293.

B Andrew Forbes, "The Chin-Ho (Yunnanese Chinese) Muslims of North Thailand," *Journal of Institute of Muslim Minority Affairs*, Vol. 7, 1986.

C Ann Hill, *Familiar Strangers: The Yunnanese Chinese in Northern Thailand*, Unpublishe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1982.

D Rawi Abdelal et al. *Measuring Identity: A Guide for Social Scientist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上许多国家的移民一样，第一代中国穆斯林扮演着生意人和小商人的角色，他们的故事为我们揭示出，对“生意人”、“商人”或“老板”这样的身份认同，与角色的社会建构紧密相关。

关注“中间商少数群体”(middlemen minority)现象研究的社会学家总结出了“中间商少数群体”大概具有的几种特征：(1)从事小生意(2)理性的“节约的”行为(3)未来时间取向和获取高成就的动机(4)知识、理性取向的宗教和自制、自律的生活(5)将经济活动视为生活的必需，而非求得救助的手段(6)为少数民族客户提供服务(7)强烈的民族凝聚力(8)屈服于成见(9)忠诚于所处的社会。泰北许多中国穆斯林移民在一些部落和当地做一些小生意，他们可以被看作是连接精英资本家和大众之间的一座桥梁。与其他民族相比，他们更喜欢做一些小生意，同时具有很强的民族凝聚力。在这个时期，许多“和”穆斯林迎娶本地泰族非穆斯林妇女作为妻子，希望以此来获得泰国公民的身份，从而能在将来稳定地生存下去，使他们刚刚开始的新生活得以维系。1949以后，东南亚地区迎来了第二波中国穆斯林进入缅甸和泰国北部的浪潮。泰国的中国穆斯林在两到三代人的时间里很快发展成为了中产阶级，相对于其他地区的穆斯林来说，这样的发展令人惊讶。

二、“泰国穆斯林中产阶级”的身份认同(1940 ~ 1990 年)

(一) 华人穆斯林中产阶级的形成

在泰国，所有的孩子都必须接受义务教育。一开始，义务教育是4年。到20世纪80年代，几乎全泰国的小学都实行6年义务教育，现在则发展到9年义务教育。Charles Keyes 论述到，尽管全泰国的人都接受了义务，但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在义务教育结束之后继续他们的学业。那些继续接受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主要是城里人，而农村孩子却很少有这样的机会。^A 农村孩子的父母认为中等教育或高等教育与他们所从事的农业生产关系不大，此外，农村学校也不能为那些想继续接受中等教育的农村孩子提供充足的教学资源储备。而且，城镇一级的学校与曼谷或清迈这样的大城市里最好的学校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这些好学校要么是一些基督教组织开办的私立学校，要么是一些重点大学的附属中学。这些小学、中学和大学之间的差别，都反映出、也制造出了泰国社会的阶级差别。

三代华人穆斯林的学历情况

(单位：人)

代 系	最 高 学 历			合 计
	低于高中	学 士	硕士或更高	
第一代	100% (42 人)	0% (0 人)	0% (0 人)	100% (42 人)
第二代和第三代	12% (22 人)	70% (130 人)	18% (33 人)	100% (185 人)

一些典型的例子告诉我们，泰国华人穆斯林移民是如何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就发展成为了清迈社会的中产阶级的。第一代华人穆斯林是一些成功的生意人，然后他们渐渐成为本地商人，之后，他们中的80%的人都选择了将他们的子女送入到泰国北部城市中最好的现代化的学校里读书，这些子女大多数都毕业于清迈大学。

泰国社会现代教育体系不仅仅是帮助创造了华人穆斯林中产阶级，它也同时帮助华人穆斯林建构了自己作为“泰国人”的感觉。Charles Keyes 指出，在国民教育学校，老师们教学生们认识将来他们作为成年人要进入的世界，这个世界在老师那里被描述成一个具有“妥当的历史的过去”的世界，而学

A Charles Keyes, *Thailand: Buddhist Kingdom as Modern State*, Boulder and London: Westview Press, 1987.

生们和其他人一起作为这个“国家”的一员共同来分享这个“过去”。^A 不得不承认，国家的建构就必须推广普及一种对“过去”的阐释（interpretation），这个“过去”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而设计的，是提供给居住在国家疆土内的所有民众的一个合法的一个国家的过去。

Charles Keys 论述说，在 19 世纪中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有成百上千的中国人移民到泰国。但与其他东南亚国家相比，中国移民后代在泰国的同化程度要更高得多。许多因素导致了这种变化。^B 首先，在泰国，中国人不得不学习泰语，这样才能和泰国精英分子交流；而在其他东南亚国家，因为这些国家曾经是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所以在这些国家的中国人可以学习说法语、荷兰语或英语。学校教育系统也推动了语言的同化。此外，泰国政府在 1939 年制定了新的国家法案，法案要求，想加入泰国国籍的中国人必须具备一些重要的条件。^C 其次，对于不是穆斯林的中国移民来说，政府鼓励他们信仰泰国的国教——南传上座部佛教而不必抛弃自己原有的宗教信仰，包括祖先崇拜。最后，许多东南亚国家纷纷脱离西方各国的殖民统治获得独立后，都曾颁布法令对华人权利加以限制，而泰国政府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不断废除或收回了一些不恰当的战前排华法令。

然而，不是所有的华人都同化到了泰国文化中。即使是那些被同化了中国人，最多只是“华泰”（Sino-Thai）而并非完全变成了“泰”（Thai）。“华泰”经常举行一些祖先崇拜仪式（当然，这些仪式中会夹杂一些佛教色彩的东西）使自己与过去的中国人身份保持不间断的联系。华人也比其他的泰国人更看重家族血缘关系，特别是父系家族的关系。也可以从职业上来把“华泰”分类。大多数“华泰”从事商业、贸易、金融行业或其他职业；很少的人从事农业。

（二）穆斯林身份的形成

宗教信仰是穆斯林认同（Muslim Identity）的根本。这一点适用于所有的穆斯林，无论他们是生活在穆斯林占大多数人口的国家还是生活在一个非伊斯兰教的国家，无论他们身处宗教虔诚的地区、宗教组织还是世俗社会。所以，宗教信仰是穆斯林身份的证明和表达。杜磊（Gladney）坚持认为，宗教认同是回族身份认同最重要的方面。^D 穆斯林通过每天的功修来表明他们的伊斯兰宗教信仰，这些功修主要源于《古兰经》和圣训中的教诲。伊斯兰教更倾向于直观性、日常性和仪式性。因此，穆斯林家庭和社区常常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们为家庭成员提供或寻求一种伊斯兰式的教育，并确保成员们成为虔诚的穆斯林。与大多数综合性宗教学校教育形式一样，伊斯兰教育关注的是人的一生，包括对人智力和精神的培养。

1930 年，泰国开始实施单一的国民教育政策。Uthai Dulayakasem 指出，当泰国教育体系为个人提供合法的证书，使他们能够成为国家的正式成员，并在社会上占有一定的角色和职位的同时，这个教育体系不可避免地威胁、破坏和损害到了与之相对的教育体系的合法性——在此指的是传统的伊斯兰教育体系。^E 现代教育的扩张对泰国南部的马来穆斯林具有消极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泰国南部说马来语的泰国人抵制现代教育。这种抵制最后发展成了将“民族性”作为政治运动诉

（下转 76 页）

A Charles Keyes, *Reshaping Local Worlds: Formal Educ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in Rural Southeast Asia*, Connecticut: Yale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 Studies.

B Charles Keyes, *Thailand: Buddhist Kingdom as Modern State*, Boulder and London: Westview Press, 1987.

C Disaphol Chansiri, *The Chinese Émigrés of Thailand*, New York: Cambria Press, 2008.

D Dru Gladney, *Muslim Chinese: Ethnic Nationalis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Dru Gladney, *Ethnic Identity in China: The Making of a Muslim Minority Nationality*, Orlando, FL: Harcourt Brace College Publishers, 1998.

E Uthai Dulayakasem, "Education and Ethnic Nationalism: The Case of the Muslim-Malays in Southern Thailand," in C. Keyes, ed., *Reshaping Local Worlds: Formal Educ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in Rural Southeast Asia*, Connecticut: Yale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 Studies, 1983, pp.131-153.

项法律法规的公民，又要拥有并随身携带身份证。但在另一方面，印尼政府官僚机构将华人置于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要成功办理身份证，他们就要比其他非华裔普通公民花更多额外的钱；如果没有身份证，他们就无法做生意或从事任何经济活动，而这却是他们在这个国家可以涉足的唯一领域。总统尤多约诺在任期间颁布的第 12/2006 号新国籍法案，其目的是试图保障印尼所有少数族群在申请各种公民身份证的基础上可以平等地获得公民身份，而事实上这项法案并没有根除国家官僚机构对华人的歧视。

然而，华裔穆斯林运用文化的方法，与以宗教为基础的群众组织进行密切合作，以获得并确保他们的社会和政治安全。华裔穆斯林的确需要这样的安全保障以保护其免于当地社会可能出现的任何反华情绪的伤害，同时也可以帮助他们免受国家官僚机构对华人的剥削和歧视性做法。与宗教组织的密切关系为印尼华裔穆斯林提供了一个意义深远的机会，他们可以增强自己身为穆斯林、身为华人的认同感。作为一个在印尼的少数族群，华裔穆斯林在表达自己的社会文化和宗教认同时越来越有自信。然而，即便是第 12/2006 号新国籍法案颁布后，腐败的官僚机构仍然对华人进行歧视和剥削，这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责任编辑 李 林）

（上接 68 页）

求的基础。但是对于泰国北部的华人穆斯林来说，重视并坚持在社区内进行伊斯兰教和传统文化知识的教育，是华人穆斯林保持其穆斯林身份认同的重要手段之一。

可以借用美国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 Min Zhou 与 Portes 的理论来分析泰国华人穆斯林的“同化”问题。在对美国多元化新移民的研究中，Min Zhou 与 Portes 提出一种多种途径的、有区隔的同化（segmented assimilation）理论，即移民被同化进社会各个阶层，一部分移民成功地融入了白人中产阶级；而另一部分人却始终处于贫困，被同化进了底层阶级；还有一部分人虽然在经济上获得了成功，却始终保持着原有的价值观。^A 区隔同化理论为研究后工业社会中复杂的移民适应过程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理论尝试，它试图解释为什么同一特定的移民群体在身处国（host country）同化成为不同区隔的群体，是什么决定了这样不同的变化。

三、结论

泰国穆斯林的许多研究，往往陷入两种极端的范式：认为各穆斯林群体与泰国社会的关系，要么是分离（secession）要么是同化（assimilate）。笔者认为，仍然需要更严谨的深入研究才能理解穆斯林认同的复杂性，泰国穆斯林与泰国的关系，既不是完全同化也不是分离对立的关系。泰国穆斯林群体不是一个同质化的群体，他们具有复杂的组成成分。泰国华人穆斯林不是被动地被同化，他们的同化可以看做是一种“区隔同化”。通过从地方到国家——“中国商人”（1940 年以前）到“泰国华人穆斯林中产阶级”（1940 年～1990 年）身份认同的改变，泰国华人穆斯林主动地建构着自己的社会、经济和宗教生活。

（责任编辑 李 林）

A Min Zhou & Portes, "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 Segmented Assimilation and its Variants,"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30(November): 74-96. 1993.